

柏杨逝世三周年紀念版

中國人史綱



柏楊

人民文学出版社

柏杨逝世三周年紀念版

中國人史綱 (上)

柏楊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0-108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人史纲:全2册/柏杨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ISBN 978-7-02-008673-3

I. ①中… II. ①柏… III. ①中国历史:古代史 IV. ①K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30024号

选题策划 常雪莲

责任编辑 胡文骏

责任印制 史 帅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河北新华第一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854千字

开 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 张 49 插页6

印 数 1—10000

版 次 2011年11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1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8673-3

定 价 99.00元(全两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出版说明

《柏杨全集》面世后,我们不断收到读者来信,希望能够将柏杨先生一些重要的作品再以单行本形式推出,这套《中国人史纲》便是应读者需求而推出的。

在编辑《柏杨全集》时,我们在遵从柏杨先生的写作习惯和风格的前提下,对《中国人史纲》中的一些表述有所改动,主要体现在以下诸方面:

一、译名用字尽量以大陆出版物规范用字代替,如“特类”改为“特洛伊”等。

二、柏杨先生对历史人物习惯直称其名,一些生僻的人名,我们已另加括号予以说明,如“伊祁放勋”即“尧”,等等。

三、书中地名较多,我们对其中已不符合当前行政区划之处进行了修订。

四、对书中“中国”、“中华人”、“汉人”等词汇的使用,在不损害作者原意的前提下进行了微调。

本次单行本的出版,仍以《柏杨全集》本为底本,增加了钱理群先生在2005年《中国人史纲》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读柏杨著作常常让我想到鲁迅》为代序。

读柏杨著作常常让我想到鲁迅(代序)*

钱理群

刚才看了柏杨先生讲话的录像,我很感动。特别是他最后讲的那句话:一个人在钢刀架在脖子上的时候,能不能坚持说真话,这才是一个真正的考验,经过了这样的考验,才能对他盖棺论定。这句话很有震撼力,里面有一种精神,我以为就是与鲁迅先生相通的硬骨头精神。

我在读柏杨先生著作的时候,也很自然地要联想起鲁迅先生。我拿到这本柏杨先生的《中国人史纲》,就想到鲁迅曾经有过的一个写作计划。鲁迅在《晨凉漫记》这篇文章里,说到他想选择“历来极其特别,而其实是代表着中国人性之一种的人物,作一部中国的‘人史’”,并且已经有一些初步的构想:“惟须好坏俱有,有啮雪苦节的苏武,舍身求法的玄奘,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孔明,但也有呆信古法,‘死而后已’的王莽,有半当真半取笑的变法的王安石;张献忠当然也在内。”但鲁迅最后说:“现在是毫没有动笔的意思了。”在我看来,柏杨先生的《丑陋的中国人》和《中国人史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鲁迅所期待的这样的“中国人史”。在书中,我感觉到柏杨先生和鲁迅先生在精神追求上的某些相通,至少有两点是相通的。

第一是两个坚持:坚持对中国国民弱点的批判,坚持对中国传统文化弱点的批判。这两个批判显示的是一种启蒙主义的立场。这样一个立场,恰好反映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时代精神,柏杨先生的《丑陋的中国人》就是在那个年代传到大陆,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柏杨先生的著作影

* 本文为钱理群先生在2005年举行的《中国人史纲》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响了八十年代的一代人,培育了一代人。

当然,到了九十年代,我们,也包括我自己在内,对启蒙主义是有所反省的,主要是过分夸大了启蒙的作用,以为只要人的思想变了,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而九十年代,一直到二十一世纪初,我们所面临的现实,却一再让我们感到启蒙的无力,制度的改造、变革与建设的重要与迫切。这样的觉悟本来是意味着我们对中国问题认识的深化,是件好事。但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总喜欢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这背后就有一个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于是,就有人着意将思想启蒙和制度变革与建设对立起来,宣扬“制度万能”,这其实与“启蒙万能”在思维方式上是完全一致的。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究竟应该怎样看待思想启蒙与制度变革、建设的关系?在我看来,它们分别抓住了中国的两个要害,是不可或缺的,因而是可以而且应该互为补充,互相促进的。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说,思想启蒙与制度变革、建设,都各有其价值,又各有其局限,甚至存在着某种陷阱,无限夸大自己的价值,没有“边界意识”,就有可能走向反面。我们已经谈到了缺乏制度变革、建设支撑的思想启蒙的无力,反过来,不注意人的思想变革的制度变革也是无用的,因为制度是要靠人去建设与施行的,就如鲁迅所说,中国是个“大染缸”,中国人心不变,习性不变,再好的制度引进中国,也是要变质的。而且在具体实践中作怎样的选择,是做思想启蒙工作,还是制度变革、建设工作,也要取决于每一个知识分子个体的主客观条件,比如说,我这样的普通的大学教师,或者柏杨先生这样的学者,大概只能做思想启蒙工作,即使思想上更重视制度建设,我们也只能鼓吹,而鼓吹其实也只是启蒙。

当然,在做启蒙工作时,应该有一个自我警戒,就是要看到自己的局限,由此形成一个立场:“既坚持启蒙,又质疑启蒙。”有了这样的立场,我们对柏杨先生的《丑陋的中国人》、《中国人史纲》这样的着重启蒙的著作,就可能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价:它是有价值的,是有利于中国思想文化的改造与建设、中国人心的改造与建设的,同时又是有限的。

但我担心,这样的有限的作用,在当下的中国大陆,也是很难发挥的——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今天的中国,已非八十年代的中国了。特别是现在的大陆思想文化界充斥着一种否定,甚至诋毁启蒙主义的思潮。有的人已经走到了这样的极端:把启蒙主义与专制主义等同起来,把五四思想启蒙运动视为文化大革命的先声,鲁迅这样的既坚持启蒙主义,又质疑启蒙主义的思想家更是被判决为专制主义的同谋,以至罪魁祸首。

值得注意的是,对启蒙主义的讨伐,除了有着前述“制度万能”的理念外,

还有两个旗号，一是“宽容”，一是“建设”。本来，就其原意而言，“宽容”与“建设”是两个很好的概念，是一个健全的社会所必须的；但在中国现实语境下，在某些人的阐释里，这样的“宽容”与“建设”是与启蒙主义的批判精神对立的，就是说，如果你要像鲁迅与柏杨先生那样坚持两个批判：批判中国国民性的弱点，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弱点，你就是不宽容，缺乏建设精神，就应该对你不宽容。而且还有一个可怕的罪名在等着你：你是破坏民族文化的千古罪人。

坦白地说，我一边读柏杨先生的这部《中国人史纲》，一边为他捏一把汗，因为他在这本书里，重点批判了两个东西，一个是中国帝王所代表的专制主义，一个是某些儒生所代表的专制体制的奴才与帮闲、帮凶。其实这也是鲁迅批判的重点。而如今无论在电视，还是出版物里，这些帝王、儒生都成了“香饽饽”，成了被追逐的“明星”。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引入柏杨先生的《中国人史纲》，至少是不合时宜的，弄不好，柏杨先生也会被某些人视为“破坏民族文化的千古罪人”。

不过就我个人而言，大概因为自己早就是不合时宜的人，因此读《中国人史纲》却能引起很多的共鸣。特别是渗透全书的民族自省精神——这也是我感受到的柏杨先生与鲁迅精神相通的第二个方面，它引起了我的许多联想。

当下很流行一句话：以史为鉴。这当然是一个对待历史的重要原则，柏杨先生的《中国人史纲》就是一部“以史为鉴”的著作。但在有些人的阐释里，以史为鉴是专对外国人讲的，那么，我们中国人要不要也以史为鉴？批判别人篡改历史，这当然很对，很有必要，但我们自己对历史的态度又怎么样？好像没有人谈，这里所缺少的正是一种民族自我反省的精神。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时，“歌颂”我们的胜利，“控诉”侵略者的罪恶成了主旋律。侵略者的罪行当然不能忘记，否则就会造成另一种遮蔽；作为普通老百姓沉湎于民族自豪感的情绪发泄，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作为知识分子，是不是应该有点理性的思考，有一点冷静的反思，反省：这本应是知识分子的职责所在。记得在五卅运动中鲁迅就提醒年轻的学生：“对于群众，在引起他们的公愤之余，还须设法注入深沉的勇气，当鼓舞他们的感情的时候，还须竭力启发明白的理性”，如果听任民众非理性的公愤泛滥，“历史指示过我们，遭殃的不是什么敌手而是自己的同胞和子孙”。（《杂忆》）但我们老是没有记性，总是忘记历史的教训，也就是口喊“以史为鉴”，实际不以史为鉴。在庆祝胜利的狂欢里，有的知识分子比民众还要狂，欢得厉害，根本忘记了引导民族反省的职责。记得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我说了一句不合时宜的话，我说校庆应该是学校自我反省的日子，结果引起轩然大波。现在在全民庆祝胜

利的时候,重提民族自省,大概就更不合时宜了。

这里有一个如何对待民族情绪的问题。鲁迅在五卅运动中就讨论过所谓“民气”。他说,一味鼓动“民气”而不注重增强“民力”,“国家终亦渐弱”,“增长国民的实力”,这才是真正的维护民族利益之道。(《忽然想到十》)一个民族不能没有“气”,但必须在其中注入理性精神;一个民族不能没有自豪感,但更要有自省精神,其实,敢于、善于自我反省,正是真正的民族自信心的表现,是一个民族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知识分子应体现并努力促进民族的成熟,而不是相反。

我看柏杨先生的著作,最感兴趣的是他对甲午战争的反省。这是中日之间第一次遭遇,我们失败了。八年抗战,我们是“完全胜利”了。据说这是“用血肉之躯”换来的胜利,胜得相当悲壮,所以曾有过“惨胜”之说。因此在欢庆胜利以后,还得想一想,这不得不以血肉之躯来取得胜利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能不能老是以血肉之躯来取得胜利?说句不吉利的扫兴的话,如果不认真总结、吸取教训,恐怕有一天我们还得用血肉之躯来抵御侵略,那就太可怕了。

柏杨先生把中日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两条,一个是科举制度,一个是贪污腐败。但是我很奇怪,科举制度现在也成“香饽饽”了。好些文章大讲科举制度如何如何好,据说西方的文官考试制度就是从中国学来的,而且据说正是废除了科举制度,才导致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因此我们现在要回到科举制度那里去,云云。我不反对对科举制度作学理的研究,对其作出更科学、全面的评价,但我奇怪的是,为什么总要回避在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与封建专制体制的密切联系这样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而且事实上我们现在也还有变相的科举制度,在我看来,我们一些地方的评职称、评什么什么点,就是科举制度“请君入瓮”那一套,这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大家都是清楚的。科举制度成了宝贝,这大概是柏杨先生绝对想不到的。还有腐败,腐败为什么屡禁不止?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大家都在谈中国腐败问题,但是很少人探讨背后的原因。柏杨先生要追根问底,也是不合时宜。

今天早上我读到胡风先生的一段话,讲抗战时期中国文化的主流思潮,胡风作了这样的概括:“只准许歌颂胜利,只准许歌颂中国文化又古又好,中国人又自由又幸福。只准许对敌人的弱点和没有出路加以嗤笑,聊快一时的人心”。如果这个时候,有人像鲁迅一样跳出来要讲启蒙主义,要反省我们自己,会是什么样一种情况?胡风因此设想了一个问题:如果鲁迅活到了抗战时期,他会怎么样?

“鲁迅活在现在他会有怎样的命运”,这是一个在鲁迅逝世以后,一直缠绕

着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在不同历史时期都会不断地提出,在1948年、1957年都提出过,前两年又引起热烈讨论。而1941年胡风的回答却是相当严峻:“如果真的他还活着,恐怕有人要把他当作汉奸看待的”(《如果现在他活着》)。坦白地说,我读了胡风的这篇文章,是非常震撼的。我实在弄不明白,我们在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时候,我们有些文化思潮为什么还和六十四年前的抗战时期的1941年似曾相识,连用词都差不多,还是只准歌颂,只准说敌人坏话,不能反省自己?而且还真有人把鲁迅“当作汉奸看待”,前不久我就在网上看到过这样的义正词严的讨伐“汉奸鲁迅”的文章,我特别感到痛心的是,据说文章的作者是一个年轻人。那么,是什么样的思想文化在引导着我们的年轻一代,这将导致什么后果呢?我由此想到,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引入柏杨先生的带有鲜明的反省民族文化倾向的著作,他又会有什么样的遭遇呢?会不会也被某些人,包括某些年轻人,当作汉奸看待呢?想到这里,我真有些不寒而栗。

但好在中国人口多,地方大,而且一种思潮垄断一切的时代已经过去。因此,柏杨先生的著作这次再度引入大陆,虽然已不可能像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样引起轰动,但也总能寻得知音,产生影响。因此,我一面担心柏杨先生的著作和当下中国大陆思想文化主流的东西相违背,是不和谐的声音,但同时又想,这可能正是柏杨先生作品的价值所在:我们正需要这样的声音。

2005年9月5日讲,9月28日—29日整理

序

一

在九年零二十六天艰难而漫长的岁月里,我埋头整理中国历史的史料,先后完成了三部书稿,第一部《中国人史纲》、第二部《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第三部《中国历史年表》(另外还有第四部《中国历代官制》。1975年春,官员要我们“快快乐乐过一个端午节”,把所有的参考书都搜去保管,规定每人不准持有三本以上的书,所以只写了一半。)。1977年4月,我回到台北,几经转折,三部书稿陆续地重回到身边。面对着汗迹斑斑、颜色枯黄了的纸册,我有无限的感恩和热情。

但书稿似乎太多了,从地面几乎直堆到腰际。想到它们在成书之后,每部势将都在一千页以上,我茫然地忧虑到出版的困难。幸而星光出版社经理林紫耀先生毫不犹豫地慷慨承当,并为它定名为《柏杨历史研究丛书》,使我由衷地感动。不过三部书稿并不是按照顺序发排的,而是倒转过来顺序发排的。并非故意或愿意如此,种种原因之下,只有如此。这只属于小节,当三部书陆续出齐的时候,出版时间的先后,就不重要了。

二

中国历史最使人困扰的是年号问题。年号本是中国在文明史上一大贡献,现代的日本和古代的越南、朝鲜、南诏、渤海,都是效法中国,使用年号的。但中国的年号却走入魔,除了表示纪年的主要功能外,另外还表示祈福、歌颂和改朝换代。一个新政权兴起,或一个新帝王登极,或发生一件自以为很大的喜庆以及什么理由都没有而只是兴之所至,都会弄出来一个新的年号。当中国内乱时,列国林立,年号如雨后春笋,目不暇给,如386那一年,中国境内

就先后出现了十六个年号。即令在统一时期,年号所造成的气氛,也十分紧张。如唐王朝第三任皇帝李治,他在位只三十六年,却改了十次年号。南周第一任皇帝武瑒在位的时间更短,只十六年,却改了十四次年号。有些时候,甚至一年之中,一改再改,如528年,北魏王朝就一口气改了三次。第一次改元的诏书刚出大门,就第二次改元。第二次改元的诏书刚出大门,接着就第三次改元,使当时的国人不胜其烦。同时也显示出这种年号制度的严重缺点,那就是,在时间距离上,造成严重的混乱。我们可以试行做一次检查:元王朝至元元年,到同是元王朝至元六年,相距几年?一般的答案当然是相距五年。这答案是对的,但不是绝对的对,事实上它恰恰相距七十七年,因为元王朝有两个至元年号,一个始于1264年,一个始于1335年。再试行做第二次检查:天授三年跟如意元年,以及跟长寿元年,又相距几年?答案是它们同是692年,相距只不过几月。假如考古学家在地下掘出一件古物,上面刻着“建平元年制造”,恐怕世界上最权威的史学家和最权威的自然科学家都不能确定它的正确年代,因为它可能是公元前6年,可能是公元后330年,可能是386年,可能是398年,可能是400年,可能是415年,可能是454年,也可能是508年。所以一个现代的中国人,置身于瞬息万变、分秒必争的时代,实在没有继续埋葬在这种纠缠不清的年号迷魂阵里的必要。我们大胆地绕过年号,采用公元纪年,希望能简单迅速,而又正确无误地立即明了历史事件的时间位置。

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号和国号是第二个大的困扰。十九世纪时,外国人曾嘲笑中国不过是一个地理上的名词,引起国人的愤怒。其实在萨丁尼亚王国以意大利作为国号之前,意大利也是一个地理名词。现在斯里兰卡共和国建立,锡兰也同样成为地理名词。事实上,在二十世纪辛亥革命之前,中国所有的王朝从来没有一个以“中国”作为法定的或正式的国名。每当一个新王朝兴起,第一件事就是定一个国号,当这个王朝统一中国时,它的国号就远压在中国之上,如清王朝的正式国号就是大清帝国。当中国陷于分裂,像南北朝、五代……列国并存,就更谁也都不是中国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景观,即四千年历史中,从黄帝到傀儡政权伪满洲国,中国境内出现了像样的或不像样的共计八十三个王朝——也就是八十三国和五百五十九个帝王,却没有一个是用“中国”显示他们的性质的。我们最熟悉的“甲午中日战争”,在正式官方文书上却是“甲午清日战争”。这种情形,使王朝号、国号,跟年号一样,造成史籍的混乱。因为谁也没有标出中国的缘故,就发生了谁在中国历史地位上是“正统”的争执,这争执由政治渗入学术,使从事历史工作的史学家,头上都好像悬

着巨斧。司马光在他的编年史《资治通鉴》中,曾为此费尽唇舌,解释他何以把一些篡位弑君、罪恶昭彰的政权用它们的年号作为正朔,用它们的王朝作为正统。但他这部价值连城、被后世列为“正史”之一的巨著,如果不是皇帝为它写了一篇序的缘故,恐怕早被查禁毁版。于是集叛徒、土匪、强盗、恶棍于一身的朱全忠之类,明明只是一小块土地的割据势力,年号却成正朔,王朝却成为正统,因而使中国产生了一种可耻的“成则帝王,败则盗寇”的史观。历史上的忠奸贤愚、是非黑白,遂大量地受到颠倒、破坏,甚至被恶毒地一笔抹杀。我们现在对所有的王朝号、国号,以及年号——包括凡是有记载的草莽英雄们,以及他们所定的王朝号、国号、年号,做一个彻底而广泛的整理,排列出来,由分类而归纳,提供出一个工具性质的参考资料,可以迅速而简便地找出所需要的答案。同时,我们更做一个从无前例的大胆尝试,即以“世纪”为单元,以公元纪年为纪年,而将王朝号、国号、年号,置于次要的地位。我们的国家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我们以当一个中国人为荣,不以当一个王朝人为荣。当中国强大如汉王朝、唐王朝、清王朝前期时,我们固以当一个中国人为荣。当中国衰弱如南北朝、五代、宋王朝、明王朝以及清王朝末年时,我们仍以当一个中国人为荣。中国——我们的母亲,是我们的唯一的立足点。所有的王朝只是中国的王朝,所有的国,都是中国的另一种称谓。我们以“世纪”为单元叙述是强调中国永远存在,不受任何王朝影响,我们绝不认为后梁帝国是正统,而前蜀帝国是僭伪;更不认为清王朝是正统,而郑成功是海盗。唐亡,不是中国亡,只是唐王朝和唐政府的覆灭。清亡,也不是中国亡,也只是清王朝和清政府的覆灭。中国固屹立如故。

中国科举制度有它的功能和贡献,但它的副产品之一是,培养出来一个中国所特有的“官场”社会阶层,在这个社会阶层中,阿谀帝王成为一项主要的课题。表现最抢眼的莫过于媚态可掬地加到活帝王头上的尊号和加到死帝王头上的谥号(为了行文便利,我们用“尊号”包括“谥号”)。上古时候,这些尊号不过一个字两个字,如公元前十二世纪周王朝第一任王姬发,不过被尊为“武王”。随着阿谀技术的精益求精,到了公元十五世纪之后,如清王朝第三任皇帝福临(顺治),他的尊号是“体天隆运定统建极英睿钦文显武大德弘功至仁纯孝章皇帝”,竟多到二十五个字,全都是从字典上挑选出来的最美丽的词汇。有些人从没有当过帝王,也会在他们头上堆砌一大堆帝王尊号,当唐王朝大祭“玄元皇帝”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就是以《老子》一书闻名于世的哲学家李耳。在史籍引叙原文的时候,这种尊号更显示出没有原则的一面,像谈到曹操,他一直到死只不过是东汉王朝的丞相,可是就在正史上,却一会儿称他是

“太祖”，一会儿称他是“武皇帝”，混淆的程度，使我们不知道所说何人，又置身何地。我们当然谅解并同情古史学家的可悲处境，但我们也不掩饰我们的失望。皇后也是如此，从最简单的“王妃”到那拉兰儿“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显皇后”。这个用全力摧毁自己所领导的清王朝女人，竟拥有这么漫长肉麻当有趣的尊号，使我们忍不住失笑。但我们最大的苦难不因失望失笑而消除，所以我们所做的是对中国五百五十九位帝王和若干虽没有实质上当帝王，却被加上帝王尊号的人，以及更多的皇后妃妾和他们所生的数不清的亲王、公主，做一个地毯式的搜索，将他们的头衔、年龄、在位时间以及他们在皇族中的关系位置，加以仔细地整理列出，使任何人都可以不必经过辛苦的寻觅，即可对他们的身世有一个明确的了解。

最后，我只能用非常少的几句话，说明我们的立场，我们的立场是中国人的立场。不同于“奉旨修史”的官员立场，也不同于以王朝为主，以帝王将相为主，以统治阶层自居的立场——他们把利益所从出的王朝放在第一位，而把中国放在第二位。我们反对“成则帝王，败则盗寇”的史观，在那种史观上，很多丑恶被美化，很多可歌可泣、代表中国人磅礴刚强、澎湃活力的智慧和勇敢，却被丑化。如三保太监（郑和）下西洋，传统历史责备他劳民伤财，好大喜功，以致史料所存寥寥，我们则认为他是中国第一位最伟大的海上英雄。我们坚持的标准是国家民族和人道人权，不掩饰污点，犹如美国历史不掩饰吊人树一样，同时也展示出中国对全世界全人类文明所做的尊严贡献。

中国人了解中国历史，应是天经地义的。可是，很多中国人对中国历史只不过知道一个片断，而这片断还多半来自小说和戏剧。中国历史书籍之多，占世界第一位，但却使人有一种杂芜凌乱的感觉。即令把正史能倒背过来，对了解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仍没有太大的帮助。何况我们没有时间读完正史，也没有文言文的修养去读正史。司马迁创造了一种新形式的史籍，这形式在公元前较简单的社会还可以应付。可是史学家却被这种形式酱住，一直沿用到二十世纪。更糟糕的是，它被改为断代史。幸好中国的王朝不断变换，如果像日本那样万世一系，根据“国（王朝）亡才修史”的惯例，中国可能成为一个没有正式史籍的国家。这些国（王朝）亡了才编纂出来的正史，又不过是一大堆人物传记的合订本，而这些传记，又多半取材于该人物的墓志铭、行传、家谱之类的一面之词，以致数千年来，墓志铭在中国文学史上，占重要的地位。凡是善于阿谀死人的作家如唐王朝的韩愈，都享有相当地位和相当财富。墨索里尼的儿子在纪念他父

亲的文章中说他父亲“喜欢古典音乐,看见我开始弹钢琴时,非常高兴。他为人极为和蔼,对人更是温柔”。我们不认为墓志铭、行传、家谱之类所提供的资料,全都比墨索里尼的儿子所提供的,更为可信。所以,我们在采用正史资料时,都一一加以判断。

三

意不尽而言不能不尽,最后,我愿述及我对丛书处理的愿望。我虔敬地把第一部《中国人史纲》献给孙观汉先生。第二部《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赠给梁上元女士。第三部《中国历史年表》赠给陈丽真女士,用以表达我无穷的谢意。

我和孙观汉先生——这位世界闻名的物理学家,迄今还没有见过面,但我集合全世界感恩的言语都表达不尽我的内心。像我这样渺小的人物和离奇的遭遇,不过是大时代中的一粒灰尘,随风飘荡,微不足道。但孙观汉先生,亘古以来,却只此一人。有人把孙观汉先生比为左拉,但孙观汉先生比左拉更伟大更艰苦。他像大海中的一叶孤舟,为营救一个从未见过面的朋友,付出他的眼泪、尊严、时间、金钱和健康,而且十年如一日。更主要的是,他的道德、勇气,不仅是我一个人,而是对祖国一片丹心和对人类一片爱心。西方有句谚语说:“为朋友死易,找到一个值得为他死的朋友难。”而我找到了,这是我的幸运,也是我的光荣。苍天可鉴,为孙先生,我死而无恨。

我和梁上元女士相识时,她还是一个发与耳齐的女学生。她第一次给我写信,那么流畅和那么有深度,使我震惊。可是九年零二十六天之后,她到台北飞机场接我归来的时候,已是大学教授了。年龄、知识、智慧和社会经验的增长,使她更坚定对我的帮助——包括精神的和物质的,也更坚定她对民族的爱、对人道的爱和对人权的尊敬。她的品格可以在一件事情上显示出来,她是一位孝女。

陈丽真女士是我的读者之一,十五年前她第一次来探望我之后,她就成为我的学生。在我的家庭破碎、妻离子散之际,她一直照顾我的生活,探望我,给我寄衣服食物,末了还为我作保。她为了帮助我,曾遭受到其他朋友所没有遭受到的风暴打击,几乎使她精神失常;但经过无数次恐惧哭泣之后,她没有放弃她的初衷,使我在孤寂中,仍享有人生的温暖和友情的慰藉,那是使我活下去的最大支持。

四

丛书是我在火炉般的斗室之中,或蹲在墙角,或坐在地下,膝盖上放着用纸糊成的纸版和着汗珠,一字一字地写成。参考书的贫乏使我自惭,但我别无

他法。而且心情惶惑,不敢想象这些艰难写出的书稿,会遭受到什么命运。所以不可避免地会错误百出,唯有乞求方家指正。

现在,总算陆续地付梓,当丛书出齐之日,我觉得我对我的民族和对我的朋友,已尽了我最大的责任和献出我最大的感恩。

1977年8月20日于台北

目 录

读柏杨著作常常让我想到鲁迅（代序）	钱理群	1
序		1

第1章 历史舞台

一 空中·马上		2
二 河流·湖泊		6
三 山		14
四 沙漠·万里长城		19
五 城市		22
六 地理区域		30
七 演员		36

第2章 神话时代

一 开天辟地		44
二 五氏		46
◎东西方世界		48

第3章 传说时代

一 黄帝王朝		52
--------------	--	----

二 姬轩辕	54
三 伊祁放勋与姚重华	57
◎ 东西方世界	60

第4章 半信史时代

一 公元前二十三世纪	62
二 公元前二十二世纪	63
三 公元前二十一世纪	64
四 公元前十九世纪	65
五 公元前十八世纪	65
六 商王朝社会形态	67
七 公元前十七世纪	68
八 公元前十三世纪	69
九 公元前十二世纪	69
一〇 周王朝封建制度	71
一一 瓶颈危机	75
一二 公元前十一世纪	76
一三 公元前十世纪	77

第5章 信史时代

一 公元前九世纪	80
◎ 东西方世界	81

第6章 公元前第八世纪

一 周政府的东迁	84
二 春秋时代	86
三 周郑交战	88